



論李鴻章的評價

作者：夏玉泉

2021 年 5 月 6 日

作者簡介：夏玉泉，1989 年澳門東亞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及 1996 年亞洲（澳門）國際公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生。

滿清從 1860 年中葉至 1911 年滅亡這段時期，內政及外交受到嚴重的挑戰：對外方面，列強為謀取經濟利益，藉武力強使清廷接受更多不平等的通商條件，無奈腐敗的清廷每戰必敗，導致中國險被列強瓜分。對內方面，由於對外戰爭連番失利，國內泛起了變革及革命的思潮，可惜經過多次改革計劃失敗，滿清終被革命所推翻。

楊洪革命（1851-1864）期間，漢人勢力隨組團練抵抗太平軍有功而抬頭，曾國藩（1811-1872）、左宗棠（1812-1885）、張之洞（1837-1909）、及李鴻章（1823-1901）等成為支撐時局的中興名臣。其中李鴻章尤為突出，從 19 世紀 60 年代至去世前，對政治及外交均舉足輕重，他在位時兼具政治家、軍事家、及外交家的職能。當時所參與的重要政事包括：創辦「淮軍」聯合外國人的「常勝軍」纖剿太平軍（1862-1864）、鎮壓捻匪（1865）；代表清廷簽署：「中法天津條約」（1885）、「中日馬關條約」（1895）、「辛丑和約」（1901）等約 30 多個條約；並且是洋務運動（1861-1894）建設的主持者之一。

李鴻章一生可算盡心竭力為滿清效勞，清末所有對外條約的簽訂都是他跟外國人談判後所達成，甚至在病逝前兩個月，還代表清廷跟眾西方國家簽訂了他平生最後的一個條約——「辛丑和約」。雖然如此，但歷史對李鴻章一生功績的評價卻有貶抑。有指他與外國所簽的全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，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；他對

外國的侵略戰爭，每每和戰不決，失去戰爭的主導權；主持變革只重建設而忽視制度，致缺乏全面而失敗。

評價歷數人物或事件，總會因每個人對事情不同的主觀心態而產生不同的結論，解決的方法有二：一、避免對歷史作評價，只對歷史進行定義及定性，僅以史實分析各事件之間的聯繫，這是「實證史學」(Histoire Positiviste)的治史方式；二、用宏觀角度看歷史，摒棄道德觀及只針對在短時間的人物與事件上，這是「大歷史觀」(Macro-History)的分析法。下面我們採用長距離觀察及實證方法，討論後人對李鴻章評價的合理性。

首先，為對李鴻章在任時所作事情背後原因有詳細的瞭解，現從三方面將清中葉以後，中國所面對的環境作鳥瞰式觀察及分析：

1. 外國列強。當時中國所接觸的國家，不論在武器、科技、及知識都遠超中國，而且她們之目的，均力圖打開中國通商之門，有時為達目的不惜使用武力。

2. 官員士大夫。組成滿清官僚架構的官員都是在儒家文化下孕育出來的士人，他們只曉得盲目地推崇中國文化的優越性。然而這些官員大都對清廷相當忠心。

3. 清室皇族。皇族之間權力爭鬥不斷，主政者與朝中官員見識相若，非但對外國的侵略者認識不足，而且又沒有動機去找尋自

己的不足，外交事宜缺乏完整的規劃及制度，只側重一、兩名官員處理對外事宜。

接著，從史實中找出相關證據，精確而客觀地鑑定上述所描述的社會現象：

1. 17 世紀末、18 世紀初，西洋以科學發明、工業發達，走進現代化境地，但中國無論在文化及科技均呈退步的狀態，這由於滿州人為維持其專制統治，採用「抑其道器揚其文詞」政策所致（羅香林，《中國民族史•中國文化的演進》）。在此消彼長情況下，中國的科技及知識較西方甚為遜色。

2. 18 世紀，清軍所用裝備仍是冷兵器與火器並用。八旗以騎兵為主，綠營以步兵輔之；武器有鳥槍、弓箭、大炮、及藤牌。而西洋軍隊已經使用火器，主要裝備有燧發槍及滑膛槍（龔勝泉，《十八世紀中西方武器裝備的比較研究》）。重要的是軍事組織落後，沒有參謀部，後勤部門，兵站管理，徵兵制度和訓練制度等等，還採用古代的糧台制度。

3. 1757 年，乾隆（1711-1799）為恐外國商人變成明代（1368-1644）的倭寇，限制中外通商只能在廣州進行，英國先後在 1792 年及 1816 年派遣馬甘尼（G. Macartney，1737-1806）及阿美士德（W. P. Amherst，1773-1857）前來商討改善通商條件（李定一，《中

國近代史》)。後因目的沒有達成，最終引致英國使用武力與清廷開戰，釀成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「鴉片戰爭」(1842)。

4. 洋務運動期間，北京設立了西洋語言學校同文館，當時有人提議在翰林館內選取年少聰穎之士進入同文館學習，大學士倭仁(1804-1871)向皇帝上奏反對：「天文算學為益甚微，西人教學正途，所損甚大。……竊聞立國之道，尚禮儀，不尚權謀；根本之國，在人心，不在技藝」(李劍農，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》)。由此可見，當時中國士大夫沒有瞭解西方文化及判斷時局，卻盲目地奉中國文化為圭臬。

5. 自咸豐(1831-1861)末年，清皇族權力爭鬥不已。先有肅順(1816-1861)專權，於咸豐崩後，阻止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；繼有同治(1856-1875)時西太后慈禧(1835-1908)與東太后慈安(1837-1881)爭權；後有慈禧獨攬政權，縱欲無度，寵幸閹臣，佞倖干政，光緒帝不甘為木偶，深具振興之心，唯慈禧處處與以為難。基此，從同治開始在皇權之爭下，政事日趨腐敗。

6. 18 世紀中、西接觸頻仍，但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洋差異之人寥若晨星，朝中重臣李鴻章及郭嵩燾(1818-1891)等雖知變革，卻只重視西學、洋務。李鴻章一封覆友人勸其擴大模仿西法方針之函件，內容如下：「鄙人職在主兵，亦不得不考求兵法，……兵乃立國之

端要，欲舍此而別求其大者遠者，亦斷不得一行其志，祇有盡其力所能為而已」(李劍農，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》)。

然而民間知識份子如康有為(1858-1927)及梁啟超(1873-1929)卻不同，他們除倡議西法維新外，還主張改革劣政。康有為在戊戌變法(1898)前向光緒進言的一段話：「今日之患，在吾民智不開，.....而民智不開之故，皆以八股試士為之。.....今群臣濟濟，然無以任事變者，皆由八股至大位之故」(左舜生，《中國近代史四講》)。最後決定準備廢除八股文取士。可知當時除民間外，朝中大臣沒有一個願意查找政府管治之不足。

最後，根據歷史上對李鴻章評價的討論配合上述歷史環境，剖析一下其中有什麼的因果關係：

1. 無可否認李鴻章跟外國所簽的全是對中國不平等條約，然而這些條約之不平等在於商務方面。例如「馬關條約」列明，日本在中國所製造之貨物僅需納入口稅，其它一切課稅均可豁免。此條款日後成為其他國家與中國訂約時因最惠國待遇而一同享有，對中國經濟收益造成嚴重打擊。其實日本的原因只是欲在中國取得更多經濟利益，此仍通商問題，與李鴻章訂約之原意無關，他已竭盡所能為清廷訂立一個最小損失的條約，只是在戰敗下缺乏更多話語權，而被日本綑紲所迫。若不是李鴻章在日本被日人行刺受傷，日本在理虧下接受

此條約，否則條約的嚴苛程度可能更甚。

2. 清朝中葉與外國的多場戰爭中，雖然李鴻章沒有對和、戰的最終決策權，但在每次兩軍對壘的重要關鍵下，由於李鴻章沒有作迅速反應，被對方完全取得主導地位，使清軍受到制肘。例如 1874 年法國用詭詐與安南政府訂立當上安南保護國的條約，後清廷在滇、粵派兵進入安南邊境，並由李鴻章與法公使共商成立「中法平和草約」，把安南置諸中、法兩國共同保護之下。當時法國新內閣不滿草約內容而未獲批准，調回法使，並通過遠征軍費，有準備開戰之嫌。朝中大臣鑒於法國悔約，主戰氣氛也很濃厚，但李鴻章卻極不願意發生戰爭，其時在法國的曾紀澤（1839-1890）見清廷久無一定主見，亦十分焦慮。

其實當時清廷進軍安南僅能以保護邊境為由，由於缺乏對法國開戰的勇氣，只能一面向法國宣示擁有安南的宗主權，一面又不敢向法國作積極敵對，直到 1884 年法軍向安南北部進展，清軍與黑旗軍皆敗北，戰端早已開始，但清廷仍無戰意。李鴻章不願開戰的原因，是清楚知道中國確實勝不過法國，而朝中大臣只具一匡熱血，從沒有評估雙方實力，並知道假如戰爭失敗，他會成為攻擊對象。李鴻章每次都站在進退維谷的境況下面向對外戰爭，故容易表現出一種優柔寡斷的感覺。

3. 有人將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，歸咎於主持者們只重建設，忽略政治制度革新，甚至梁啟超批評李鴻章「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」。綜觀 19 世紀 60、70 年代，知道洋務的人已經不多，要求引進西洋制度又談何容易？況且當時主張模仿西洋的人都以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為原則。著名思想家馮桂芬提出「采西學、制洋器、籌國用、改科舉」的建議，其本質又是「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，輔以諸國富強之術」，故可說李鴻章的洋務目標實走不出時人的觀點。

李鴻章算是最早認識西洋炮艦威力的大臣，1862 年他率淮軍在上海與「常勝軍」並肩鎮壓太平軍時，眼看西洋「輪船之迅，洋炮之遠」有極深印象，深感「中國軍事遠遜外洋為恥」，莫不主張「將來師夷智以造礮製船，尤可期求久之利」。所以當他主理洋務運動後，積極興辦船務、練兵等軍事建設。這無疑是受其初心所影響。

假如缺乏全面改革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，但當我們看到鼓吹全盤西化的戊戌變法同樣地失敗，那這解釋又如何自玄其說？正確是晚清兩次變革全因政治腐敗所致，是最高領導者阻撓的結果。從權鬥勝出的慈禧太后，沒有像武則天（624-705）的雄才大略，一心只憑藉權位來獲取利益，完全對國家前途於不顧。洋務建設耗用大量國庫，使她可用於享樂的支出減少；維新改變政治結構，對她的地位構成威脅。這全是政治因素使然，似乎不能怪責洋務主持者們之不

是。

根據以上分析，對李鴻章的三大評價：簽署不平等條約、作戰時優柔寡斷、及變革不全面，均有其客觀原因，縱使換上他人，結果都會不變，這就是歷史學者黃仁宇所指「歷史的長期合理性」（Long-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）。

下面是一些知名人士對李鴻章之評語：

日本首相伊藤博文—「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」

慈禧太后—「再造玄黃之人」

孫中山—「我中堂佐治以來，無利不興，無弊不革，艱難險阻，尤所不辭」

梁啟超—「不學無術、不敢破格，是其所短也；不避勞苦、不畏謗言，是其所長也」

不同人甚至同一個人對李鴻章都有不同的評價，就此而論，對事件及人物作評價是毫無意義的。嘗試拋開道德枷鎖，讓視線放在因果關係上，可能會有更多的體會。